

# 政治科学大纲

邓初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D03/7

7.1.2

# 政治科学大纲

邓初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政治科学大纲  
zhengzhi kexue dagang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插页 205千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0册

统一书号：3190·040 定价：0.98元



邓初民同志

## 纪念著名的社会科学家 邓初民同志

张 友 渔

我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知名的民主教授邓初民同志以九十二岁的高龄与世长辞了。今天，当我们在这里举行学术座谈会纪念这位卓越的社会科学家的时候，首先回顾一下他从事革命活动和学术工作的一生。

邓初民同志是湖北省石首县人，一八八九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九一二年他考进了宋教仁办的武汉江汉大学。次年得亲友资助，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学。一九一七年底回国，一九一九年到山西太原进山中学和法政专门学校等校任教。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任湖北法科大学教务长，经董必武同志介绍，秘密参加国民党工作。北伐军攻克武汉后，被选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并担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委员长兼武汉中山大学教授，并在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过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初民同志逃出白色恐怖笼罩的武汉，转移到上海，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并担任“社联”主席，积极从事宣传鼓动工作。他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法政大学任教。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解聘，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因支持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在内地难以立足，被迫出走香港。继后，辗转流离，到达桂林，受聘于广西大学。抗战期间，他先在成都朝阳学院任教，

后到重庆，从事抗日民主运动。一九四一年他在重庆加入中国人民救国会，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委员，主编《民主星期刊》和《唯民周刊》等进步刊物。一九四七年由上海转赴香港，在达德学院任教。建国后，邓初民同志历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山西大学校长，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邓初民同志是我国知识分子中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者之一。早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河上肇的影响，回国后立志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早在“五四”时期，他在山西太原任教，就开始用社会发展史和恽代英同志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上的文章教育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启蒙宣传。我认识邓初民同志就在这个时期。当时，我是太原师范学校的学生，邓老和其他几个大学教授办了个杂志《新觉路》，宣传进步思想，吸收了两个学生做编委，我是其中之一。虽然我们的年龄相差不远，但他是教授，我还是个学生，可算是“忘年之交”。邓初民同志在国内许多大学教过书，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每到一处，他竭力运用大学讲坛和出版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他的许多学生和受他影响的进步青年，不少人今天已成为我国的负责干部或理论工作者。他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和革命的教育家。

邓初民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他在社会科学中涉猎的方面很广，但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通俗的语言和流畅的文笔传授给他的学生和读者。

首先，他十分注意传播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方面，主要是通过讲授社会发展史来进行的。他在许多大学开过这门课，并且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如《社会发展史简明教程》、《社会

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等。在这些著作中，邓初民同志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他在《社会发展史简明教程》一书“序言”中说：“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一切现象，都是遵循一定的法则，有一定的必然的因果关系。社会构成过程和社会变革过程，也自然要遵循一定的法则，有一定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可以被人们发现。”这就是他写这些书的目的。可贵的是，早在五十年前他就指出，根据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很显明的事实，可以推断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并且十分鲜明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五个特点：一、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二、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三、促进生产力无限发展及劳动者生活日益改善；四、不劳动者不得食；五、新型民主的国家。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敌对阶级专政而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他说：“劳动阶级的独裁，就他方面说，就是劳动阶级的德谟克拉西，并且较以前任何德谟克拉西，都还要德谟克拉西，还要彻底些。”这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黑暗的中国，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的。他教育人们抛弃黑暗，追求光明。

其次，邓初民同志非常重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这方面，主要是通过讲课和著书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一九四八年，他在香港南方学院讲授《社会科学常识讲话》时，就用了很大的篇幅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科学的哲学是建立在唯物论的哲学基础上的。只有把科学建筑在唯物论的哲学基础上，才是可靠的，才能帮助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才是真正有用的科学”；“科学不仅要建筑在唯物论哲学基础上，而且还一定要建筑在辩证法的唯物论哲学基础之上。”他的这份讲稿，经他的学生整理，解放后得以出版。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邓初民同志为在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出了巨大努力。解放之前，在我国大学讲坛上流行着形形

色色的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反动政治学和宣扬虚伪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政治学。邓初民同志力排众议，独树一帜，在他对世界各国政治作了研究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建立了新型的政治学。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一九二九年由昆仑书店出版的《政治科学大纲》和一九三二年署名田原由新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政治学》。这两部书主要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政治”与“政治科学”在社会总体构造中的地位；（二）“政治”与“政治科学”的本质是什么；（三）政治科学是用什么方法处理各种政治现象，即如何说明国家的本质及其辩证法的过程。在回答政治学的内涵时，他说：“以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用科学的方法，达到从混沌的政治现象中，抽出因果关系法则的目的之学，便是政治学。”他在书中论述了政治学的性质、概念、研究方法、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特别是为建立“政治学之说明体系”——社会阶级与政治、政党、民族、政治的统制、国家，作出了贡献。这些基本的观点，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从事政治学研究仍然有着意义。

邓初民同志并不是一个关在象牙之塔中的埋头著书立说的学者，他一直把他的教学和著书工作与当时中国革命的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是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积极参加了武汉革命政府的工作，支持各界人民反对列强、打倒军阀的斗争，对不法土豪劣绅予以严厉制裁。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一面教书，一面积极参加“社联”的活动，团结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出版刊物，组织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鲁迅主持的“左联”一道，在文化战线开展反“围剿”的斗争。到了广州，正值“一二·九”运动高潮，他坚定地站在爱国师生一边，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四十年代他在成都任教，公开在讲坛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的方针，揭露国民党卖国投降的行为，和马哲民、黄松龄同志一道，成为全国知名的“民主教授”。



特别是到了重庆，邓初民同志在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关怀和帮助下，全力地投入了爱国民主运动。这时我正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工作，和邓初民同志接触频繁。他常为《新华日报》写文章，呼吁民主政治，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在这段时间写过两本书，一本是《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一本是《世界民主政治的新趋势》，影响都很大。我也多次以“若愚”的笔名在他主编的《民主星期刊》上发表文章。记得《唯民周刊》第一期上，就登有叶挺同志的一首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申述了叶挺同志的宁死不屈的革命意志。抗战胜利后，我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新华日报》（重庆版）社长，邓初民同志仍留在重庆。记得李、闻惨案后，他的名字已上了黑名单，但是他仍不畏艰险，出席了重庆各界人民举行的李、闻追悼大会。一九四七年，他到了上海，尽管白色恐怖严重，但白天仍然到大学和职工集会上作报告。他善于讲演，声音洪亮，田汉同志称他的讲演是：“几声狮子吼，掀起大江波。”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为我国民主革命而战斗的“民主教授”。

邓初民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身信仰，是和他组织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茫茫的黑夜，当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人类智慧的结晶时，便毫不犹豫地以此作为终身的信仰；当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后，便很快把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尽管他相当长的时间并不是党员，但能把自己的行动和事业紧紧地与党的斗争方向联系在一起。他最早认识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李大钊同志，并在他的指导下，在留日学生中积极开展反对袁世凯和日本政府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在大革命时期，他在武汉和董必武、陈潭秋、吴德峰、李哲时（李文宜）等共产党人并肩战斗，并向陈潭秋同志表示：今后无论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也一定要直接间接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做。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主持的“社联”，和

鲁迅主持的“左联”一样，是党的外围组织。在广西大学任教时，他受到张云逸同志的帮助，并且从张云逸同志那里阅读到了党的文件。到了成都，他常和车耀先同志接触，并受党指示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重庆，他则直接在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到了香港，仍然和党保持紧密联系。他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并在民主人士中积极宣传。一九四八年底，在党的安排下，他乘船离开香港，奔赴祖国东北解放区。

解放后，邓初民同志服从党的安排，离开北京前往山西任职，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因病辞去在山西的职务，居住在北京。这以后，他基本上是在病榻上度过的。

邓初民同志是一九六二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他已七十三岁高龄。在这以前，他组织上虽然没有入党，思想上却直接接受党的领导。这就是他成为坚强的“民主教授”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的原因。他说：“知识分子只有依靠共产党，依靠集体，依靠人民，才能找到前进的方向，求到进步的勇气，也才能在革命和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入党后，邓初民同志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一九六四年，他书写了一付对联：“尽管既老又病，还得勤学苦干”，一直挂在他的床头。他一直把周总理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指示作为座右铭。晚年，他眼睛看不见了，耳朵也逐渐失灵，但仍然用高功率的助听器坚持收听广播，在病床上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大事。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深恶痛绝，口述整理成文予以声讨。

邓初民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勤奋好学、生活俭朴、待人热忱。他所经历的道路，正是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不断进步、献身革命的道路。在他辞别人类世界之前，他说：“同志们，朋友们，让我激起我的青春活力，大声再讲一次，一个人能够在阳光灿烂的大地上，为中国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工作，该是何等幸福，

愿你们工作得更多，愿你们工作得更好！”这是他最后呼唤出的心音，话语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今天，当我们举行这个小型学术座谈会来纪念这位知名的学者和民主革命活动家的时候，无疑对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将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鞭策。

## 代序二

# 坚持马克思主义， 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一生

——纪念邓初民同志

杜 任 之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和革命教育家邓初民同志与世长辞了。我想将他一生对人民的主要贡献作一个概括的介绍，来悼念他并从而教育青年一代。

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

初民同志于一九一一年在宋教仁主办的江汉大学学习时，看到一本《社会发展史》，醉心于原始社会，希望做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社会的人，因此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初民”。为寻求民族自由、平等和救国的道理，他到日本留学，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的影响，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主要著作；参加了留日学生总会，编辑会刊《民彝》，认识了李大钊同志；在神州学会又认识了林伯渠同志。由日归来后，因同学关系，在太原进山中学任教，并任《山西日报》记者。“五四运动”时期，他代表山西新闻界到北京开会，看望了李大钊同志。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他极其深刻的影响。他接受李大钊同志的指示在山西开展工作。他在进山中学任教时，以“社会进化史”和《中国青年》杂志上的文章作教材，很受学生欢

迎，后来好些学生都成了党的中、高级干部。

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前夕，初民回湖北参加革命工作。他在湖北法科大学任教务长。当时董必武同志主持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工作，约他参加党部的工作，并当选为执委会常委兼青年部部长。执委会成员多为共产党员，陈潭秋同志征求他参加共产党，他自己认为“在党外比在党内为党工作较为有利”，但他同时向陈潭秋表示：“无论在什么困难条件下，都一定遵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指示办事”。

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上海和广东、香港各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由香港到成都再到重庆，都在有关大学教书，并在党的指示下进行革命工作。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初民同志任山西大学校长兼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因病于一九五二年才到山西。当时我任山西省财委会秘书长、商业厅长兼山大财经学院院长，我们经常面谈。有一次他说：“我和党接触并接受党的指示做革命工作近三十年，但我还不是党员。”我说：“邓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写了那么多的书，做了许多民族解放、民主运动的工作，是党的亲密战友，但总不如参加党对革命工作更为有利。”他说：“在党长期艰苦斗争时期，我觉得自己条件不够，没有入党；现在革命胜利了，我要求入党，就有‘投机’之嫌。”我说：“解放前你虽然没有入党，但在白区以民主人士身分对党做了许多工作，大有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今后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路途还是很长的。现在入党也很好。”他点头表示同意，并说：“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党接触，常能看到党内文件，我想现在先看党的文件，直接受党的教育，然后再申请入党。”我向山西省委反映了他的要求，不久他重新阅读党内文件。一九五五年他调到北京后（任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和民盟副主席），直接与统战部接触，后由周新民同志和张庆孚同志正式介绍入党。他入党较晚，但对自己严格要

求，自觉地做一个好党员。

## 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 和坚强的民主战士

初民同志是在日本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回国以后，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结合在大学教课和中国的实际政治情况，先后编著过十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武汉，初民同志接受党的指示，由武汉到了上海，在暨南大学和上海法政大学任教，这期间编著了《政治科学大纲》；同时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并任主席。国民党反动派查禁革命书刊，特务捣毁进步书店，初民同志化名“田原”，出版《政治学》一书。一九四七年，初民同志联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中国的人民民主运动，编写了一本《世界民主政治的新趋势》，其中提到“新型的民主政治”。抗战时期，他编写了《社会史简明教程》、《中国社会史教程》、《社会进化史纲》，书中讲到“史前时代、原始共产社会、奴隶制古代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些观点在解放前是可贵的。联系到当时的“民主宪政运动”，他写了许多论文，结合在大学讲授民主理论，编写了富有战斗性的《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一九四八年，他在香港南方学院讲课，编著了一本《社会科学常识讲话》，一版再版，影响很大。全国解放后，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时，他把原书作了订正补充，于一九五一年重版，书中主要内容是讲“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与社会学，社会结构与社会变革，社会结构中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一九四九年初，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原理，他编写了《新中国政治问题讲话》，其中讲到：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

化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等问题；土地改革与武装斗争问题；统一战线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问题。一九五〇年，联系到当时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他编写了《阶级、阶级斗争概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阶级斗争的具体历史过程，以及中国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状况”，供当时学习阶级斗争理论参考并指导阶级斗争的实践。

五十年代初期，初民同志任山西大学校长时，青年团开展了“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运动，他联系运动实际编写了《怎样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一书。

邓初民同志的这些著作，特别是解放前发表的一系列专著，以及他在大学的讲课，向社会的宣传，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占领阵地，启发千百万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自五十年代后期起，近二十多年来，初民同志经常在病中，加上接待青年来访，回答来信和参加各种会议，除口授写过一些文章外，未能写过专著。据说，他在病床口授让他的秘书编写一本《辩证唯物论体系》，可惜没有完成。

抗战前后，邓初民同志辗转流离，从香港到桂林，由桂林到武汉、成都，最后到了重庆，一路上在各个大学任教，并接受党的指示进行活动。在成都时，他接受党的指示做地方实力派工作，以抵抗蒋介石独裁。在重庆，他常与周恩来同志接触。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经常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并先后主编《民主星期刊》和《唯民周刊》，时常被特务尾随侦察，但他毫不畏惧，依然不断战斗。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开始了。“较场口惨案”发生后，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还扬言在上海暗杀沈钧儒、陶行知，在重庆暗杀邓初民。这个消息在重庆《新华日报》登出后，初民同志毅然决然地仍在重庆参加了追悼李、闻大会。

一九四七年，他随民盟中央到上海开会。当时上海白色恐怖异常严重，初民同志仍照常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并到许多大会和职工集会上去作报告。民盟被蒋介石禁止后，他到香港，在达德学院任教。他批判中间路线，继续进行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斗争。一九四八年初，初民同志由海路到了东北解放区。

从以上经过情况来看，邓初民同志不愧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和坚强的民主战士。

###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和革命教育家

邓初民同志一九二九年编著的《政治科学大纲》是一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如同李达同志当时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体系一样，初民同志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他在序言中指出：“政治是经济之集中表现，离开了经济结构，便不能够说明活的、变的政治”。他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社会，认为整个社会分为“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部分，表现于人类生活的是“社会生活过程、政治生活过程、精神生活过程”。他为政治学下了个定义：“以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用科学的方法达到从混沌的政治现象中抽出因果关系法则的目的之学，便是政治学。”在国家一章中，他甚至讲到“国家之死亡的过程及未来的社会”。他说：“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有一个过渡时期的国家，这一过渡时期的国家较之资本主义社会的旧国家其所需要的国家权力还要广而专一，而国家之阶级的支配也更为明显而强烈，此即所谓政治上的独裁”。他所谓政治上的独裁，即后来我们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又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敌对阶级的专政，而对劳动阶级内部则是民主的，比以前任何民主都要民主。我们可以看出，在五十年前他已描述了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多么可贵啊！



他用“田原”的名字出版了《政治学》和《新政治学》。他的政治学体系分为阶级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革命论等等。

初民同志在五十年以前的旧中国写的这些著作，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主义政治学也还有参考的价值。他不愧为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家。因此，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推举他为学会的名誉会长。

初民同志也是著名的教授和革命教育家。他在中学和各大学教书，启发了千千万万青年的政治觉悟，引导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他在五十年代初期所编著的《怎样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一书，在今天对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初民同志说，他写这本书是企图“使青年们初步认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危害性，树立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从而把全部力量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之中”。他在书中首先论述了道德的概念、起源、发展、共产主义道德的形成过程；其次，说明了道德与宗教、政治、艺术、哲学的关系，资产阶级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在两种制度斗争中的作用；然后着重阐明了加强劳动教育、爱护公共财产、纪律性和组织性、忠诚、老实、勤俭朴素，批评与自我批评；还讲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并阐明了集体主义教育的特殊重要性。

在怎样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问题上，他提出了革命领袖的典范作用和一切先进人物、积极分子的模范作用。他说，道德教育必须以政治思想教育为基础，必须结合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来进行；必须结合各种具体的实际斗争来进行；并指出道德教育的长期性、艰巨性。他主张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其意义有两方面：一方面诚恳地、耐心地对青年进行说服教育，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一个青年必须德才兼备，身体健壮，必须有“表里一致的统一人格”；对犯有错误的青年和比